

我的江老师和魏老师

中年其实是一个最不善抒情的年龄。孩提有童趣，少年有幻想，老年有回忆，这一切似乎都与中年不沾边。人到中年，执著于事业，奔忙于生计；在现实的生活面前，中年人的想法是现实的，连语言也是现实和简短的。处在这样的年龄，往事大部分都被尘封起来了。然而，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却有时会被荆棘似地涌出来。你会想起，偶尔它会如烟如雾，总是淡淡地在你心头滑过；但如果稍作滞留和品味，它就会在心头疯长，直至所有的细节都清晰起来。

起因于一次同学聚会，这样的记忆突然被开启。我长久地想起了我中学时的两位语文老师：江老师和魏老师。往事一旦被调动，简直挥之不去，最后竟至辗转反侧。从床上爬起来，在黑暗中摸索到客厅，燃起一支香烟，看着烟头一闪一闪的光亮，慢慢地想，慢慢地品味。我惊讶于这种回忆的绵长，也惊讶于自己形诸文字的冲动。我与我的两位老师的师生之谊，其实是一种苦难中的情谊。在那样的年代里，江之浒老师，一位才华横溢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生，1957年被错划为“右派”，1960年，他像一粒被狂风裹挟的沙砾，完全失去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，无声无息地飘落到大西北的宁夏同心县。在乡村，他和社员一起背粪、拉犁，一起吃公共食堂——后来他曾对我回忆道，同心清水河的苦咸水熬成的稀粥曾让他一天泻过16次。捱过了艰难饥饿的岁月，又在县城中学干了10年的重体力劳动。1973年，这才“摘帽”教书。

传道授业解惑的历史一翻开，他人生的苦难便不再只是苦难。

从此，一群“读书的种子”便与他结缘。后来的一颗颗政坛上的新星、一个个学术界的骄子，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启蒙，并最终奠定了安身立命的基础。从此，我的家乡豫旺就有了一位作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名牌大学的毕业生。贫瘠干渴的黄土地

因为他的到来而变得温柔湿润。

我长久地思考着这样的现象：贫困的农家子弟，从世代居住的窑洞中走出来，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中翘起上路，会有那样一些人，对知识的汲取达到如此坚忍不拔的地步；而那个被污辱的灵魂一经解放，便会如此深情地拥抱他脚下异乡的土地。他的学生中，如今有省部级、司局级干部，有名校的博导，也有多名博士。我之所以称为“现象”，因为这实在是人才成长的一种范例。那是一种干柴与烈火的结合，是如饥似渴与孜孜不倦的最权威的形象注解。用抽象的内因与外因、主观与客观等概念去解释，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
难道人才的成长只有破蛹化蝶、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这样一种模式？衣衫褴褛、食不果腹的莘莘学子与饱受生活重压、人生的考验已达极致的老师的相遇，便会产生如此壮丽的景观？

从12岁那年进入豫旺中学开始接触江、魏两位老师，我人生机缘中的一些奇迹也就此埋下了伏笔。背着一周的咸菜、烙饼、黄米、高粱面——这是我的母亲所能给我的最多最好的照顾了！翻山越岭，步行25公里山路，来到豫旺中学。住校一周，然后再重复这样的路，重复这样的行囊，我的中学时代就在这样的重复中开始了。

我猜想，那个羸弱的少年一定没有给江老师留下什么印象。当时，他并没有教我们语文，而是按照那个时代的特需，讲农业基础知识。在“农基”课上，曾有过我和他一次碰撞式的交流。那是一次试验，大约是要每个同学准备土豆和萝卜，挖出小坑后盛上盐水，12小时后观察它们各自的变化。下堂课，江老师一上讲台，首先问大家这个试验做了没有，而回答他的是教室里的一片静寂。那个学工学农的时期，是最适宜儿童尽情游戏的好时光，有谁会去认真做什么试验！“学习委员呢？”他大声问，犀利的目光直视着大家，显然生气了。我嗫嚅着站起来。“你是学习委员嘛！你做了没有？”江老师料定我也是不会做的，语气中带着那种失望以后的严厉甚至是嘲讽。

“我做了。”我小声作答，并告诉他土豆和萝卜的不同变

化，同时要起身去窗台上拿我的样品。因为有盐水，我不能把它们放在书包里。“不用了。”我感觉他已转怒为喜，并用赞许的目光看了我一眼。教室里的空气似乎流动起来了，我也悄悄地嘘一口气。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与江老师也并没有更多的接触。除了听课，对他的其他方面我一无所知。印象中，他总是一年四季穿永远不变的一双黄色的胶鞋。他在学校里散步、上街买菜，总是走得很快。那是一种勇往直前的走，眼睛总是看着天，对脚下似乎不屑一顾。他像风一样从我们身边走过，我们会很快躲在一旁。等他走过去，再从后面偷窥。对孩子们来说，“北京大学”、“右派”和江老师连在一起，那就是一个谜。我们总喜欢一起在背后琢磨他、议论他。说他脑后有眼，会在监考时突然以极快的速度来个向后转，并准确无误地逮住那个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正在作弊的学生；说他常在厕所里看书（那时都是乡间的茅厕），并且在厕所里背字典——背完两页，撕下来充做手纸，被撕掉的内容他能倒背如流。前面的“事迹”，有许多同学领教过，我没听说过有谁能“大难不死”，还有谁敢在他监考的考场里“横刀立马”；而后者就不得而知，但我确实看见过他手里拿着书从茅厕中走出。我想，入厕读书的习惯应该是有的。

初中的两年，我没有机会领教江老师作为语文老师的风采。那时教我语文的是他的夫人魏挽淑老师。

我以为，要找到“名如其人”的典型例子，应该是魏老师了。她的娴静、文雅，是“挽淑”的最好注脚。多年以后，我在自治区机关工作，也曾多次到她的家乡隆德县搞调研，但印象中从未见过她那样白皙、文静、书卷气十足而风姿绰约的女子。她总是沉静。我上大学后，每逢假期回乡，总要去拜望两位老师。照例，江老师与我们海阔天空地聊，魏老师静静地在一旁坐，偶尔会插几句话，但不多。虽然他们都是我的老师，但即使是在这样的场合，魏老师也总是把自己置于夫唱妇随的配角位置。她与江老师之间，恰似宋词中婉约与豪放的分野。精神大餐之后往往是饥肠辘辘。这时，魏老师总要下厨做手擀长面给我们吃。那时

还是粮食、副食品定量供应的年代，我们确实也少不更事，只觉得手擀面好吃，吃了还想吃，哪会再去想这也许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不便。

上语文课的时候，魏老师的风度，还有一手漂亮的板书把大家都迷住了。初中两年语文课，我只见过她一次不耐烦的神情，那时正值批林批孔批水浒。为配合形势，在语文课上同学们要发言评水浒，一位仁兄正张冠李戴、大讲特讲所谓的梁山108个好汉，并把张飞、岳飞等一帮好汉都拉扯进去，一古脑儿煮进“水壺”。魏老师先是静静地听着，脸上泛起红晕；既而很不耐烦地打断，说“是这样的，我来说吧！”于是，她讲《水浒传》是一部什么书，情节、人物是什么，毛主席评《水浒传》的那一段话应该怎么理解。若干年后，我在读中文系汉语史专业的研究生时，就是从《水浒传》作起，把这部代表近代汉语语法特点的书几近翻烂，并以此为中介进行溯源及流的工作，研究了一种语法形式的历史嬗变。

1977年。不用详述，对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的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个什么样的年份。高考恢复了。从这年的冬天开始，一年有半，喜讯两度传来，谁谁考上了大学。上大学，就是翻身把歌唱，就是鲤鱼跃龙门，就是走出黄土地，做拿工资的干部。父辈的重托，改变自己命运的希望都在这一刻。学啊学，头悬梁，锥刺骨，不信春风唤不回；考啊考，咬紧牙关挺过去，这是最后的斗争，要争取最后的胜利。这里就是分水岭，要么回乡子承父业，去捣牛后板筋；要么穿个四棱见线，搏它个封妻荫子。这里就是转折点，要么跃上巅峰，要么跌入低谷。在穷乡僻壤，大学生宛若旧时中举的举人，老乡们会争去看稀罕，同学们也会引为楷模。我记得有一个赶集日，一位上了大学的学兄放假归来，他往街上一走，就成了明星。我务农的哥哥也要拉着我去看。我的恼怒突然而来，“看什么看！有什么好看的？”嘴上这么说，心里面却在发狠，“明年让你们都看我！”

这时是我的高一。语文老师成了江老师。学习语文吗？去找江老师。你看他的名字：江之浒。“浒”是什么意思？要查古汉

语字典。浒者，水边也。唐诗有云：“无由达江浒”。那是有来历的。你去听江老师讲课，一首古诗，他读一遍，你就会记住；一篇古文，他一串讲，你就忘不掉那些怪头怪脑的词句的释义。江老师讲柳宗元的文章，字句铿锵：“黔无驴，有好事者船载以入。……他日，驴一鸣，虎大骇。”并配以手势和身体动作，古文也就变成了白话文，略带江浙口音（他是江苏南通人）的普通话就是最标准的国语。

偶尔，他会在语文课上和我们聊天。说到兴奋处，古今中外，文史哲，天文地理……。他一边说，那一双总是犀利严峻的眼睛便会变得温柔起来。我总是忘记了他在说什么，只盯着他的眼睛。他的眼睛生动极了，会一闪一闪、一眨一眨，仿佛一闪之间就会打开知识的另一座宝库。

我从大学中文系毕业，继而又考取中文系的硕士研究生，后来又转而念了经济学的博士。自己虽常有“染缘易就，道业难成”的慨叹，但所见过的硕学之士也并不少。不知怎么，我总是不自觉地用“高山仰止”、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这样的圣门弟子语言来暗暗形容我的江老师。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总是这样问自己。也许，圣门弟子在说出“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后”这样的话后，一定掷笔长叹，在无以把握的惆怅中给后人留下了这样一种飘忽不定、难以琢磨的空灵。我非敢自比圣门弟子，只是想这大体是一种体验罢。

而我与江老师的私谊，这时只是一个开始。是那样的一些细节，为这种开始做了铺垫；又是那样的一些细节，组成了我永远无法忘却的念想。西人有谚语说：地狱里尽是不知感激的人。我对我的江老师和魏老师是心存感激的。我在参加1979年的高考时，面对着无书可读的尴尬，江老师翻检他几经流失而幸存的藏书，按照复习大纲，像做题那样，用蝇头小字写成复习资料送到我手中让我复习。乡村缺电，那是他在烛光和煤油灯下熬夜写成的。多年后，大家共同回忆起江老师的教诲，当时的同学中还不曾有谁吃过这样的“小灶”，不曾有谁有过这样的“宠幸”。顺利考过大学的分数线后，16岁的我依然羸弱，个头只有一米六，

体重不及45公斤。我从未走出过乡镇，对外界懵懵懂懂。考上大学的惊喜，几乎要被即将到来的第一次远行的忧虑所替代。怎样填写志愿，上什么样的大学？我又敲开了江老师家的门。他似乎早有准备，很快帮我选了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并举出三条理由：首先，西安也是一个大城市，你可以见见世面，但又不至于太远；第二，学校是好学校，是重点大学；第三，师范院校包伙食，对贫困的家境较合适。这样的细致入微，我还能有什么话好说？如果仅仅是师生之谊而没有亲情，会有这样的体贴吗？每当想起这些细节，我会惆怅和伤感。所谓“高山仰止”，我不光是说他的学问。他的人品，他的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，他对贫困的乡亲和黄土地的感情，是我无法诉诸笔端的。

今年应该是江老师的70大寿吧！遥祝我的江老师在遥远的南国精神矍铄，并请他“总不至于太拂了大家的心意”，在他的第二故乡作次巡回。与江老师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细节，我还会写一些的，并渴望他看到后会还以莞尔的微笑。

杨占武 二00五年五月九日

附记：这篇小文写就后，我将它寄给了江老师。承他读过后订正了一些细节，还对一些词句做了“批改”。在文章的第九自然段尾，注了这样一段话：

江老师：……我想起中学时代您给我讲过的《藤野先生》了，其实，鲁迅先生挺有福气，尚有一张照片常让他回忆；您可是一生中唯一对我失约过的一次，所热切盼望的照片终于没有寄来。……我在1987年毕业后留校了。……每次能写点东西时，总是想起您在那块平凡的土地上对我这个幸运者的提携。也许发配至宁，对您是一件不幸，但从纯个人的角度，我却是直接的受惠者。您的弟子 占武 1989.1.23——摘录你给我信的一段

(注：杨占武，现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社科联)